

■人物素描



我的处世方式来自我的基本性格

——美国前财长,现任美国花旗集团执行委员会主席鲁宾

鲁宾:呆板的生活会令我窒息

人们总把鲁宾跟不确定事件连在一起

因为潜在的利益冲突,鲁宾今年8月突然宣布辞去福特董事一职。他是美国花旗集团现任执行委员会主席,福特并购似乎与花旗有关联,外界的猜测很多。

而多年前,人们对于一个在高盛做风险套利的商人,能够成功辅佐总统治理好一个大国的经济,有过无数的猜测。其实这是美国政治和经济的一个特征,只要你拥有掌控大笔资金运作的机会,就会交上无数政界的朋友,那些奔波在华尔街的志愿者们,经常是身在华尔街,脚已经踏在政界门槛里。鲁宾只是他们中的成功者之一。

曾在高盛集团就职的鲁宾,被选入克林顿经济智囊班底后,1993年出任任美国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,并于1995年到1999年期间出任美国财政部长,其间美国实现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长时间的经济发展和繁荣。

律师曾是就读哈佛法学院的鲁宾大学毕业后第一个职业,但他无法忍受刻板的案例分析研究。28岁有机会进入高盛,套利业务让他感到灵魂的震撼,他确信自己是干这个的。风险套利需要足够的体力和智慧,更需要有极大的心理承受力,鲁宾如鱼得水。永远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的那种令人发疯的生活、飘忽不定的感觉,在鲁宾看来那才是最适合自己的。他走出白宫后,不少人建议他用特殊的社会关系从事慈善事业或社会公益事业。经过再三思考,他还是回到了投资银行,继续行走于那不确定的世界中。

虽说鲁宾夜以继日奔波在他认定的不确定世界里,人们还是发现有一点是确定的,那就是鲁宾在对付不确定事件时的方法和绝对认真的态度。他走到哪里都认真记笔记的习惯,还随时在本子上用记下的数字来测算,用精密的分析衡量概率,以便在决策时试图考虑到交易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。

思维的奔放和作风的严谨,成就鲁宾登上更大的舞台。

带着华尔街气息入宫

鲁宾一生有很多意外。当年他从华尔街走进白宫时,正好赶上克林顿上台实行国家经济决策程序的改良。在宣布克林顿经济班底时,有人很不客气地质疑,一个从华尔街走出的富商,怎么可能去考虑美国工人阶层的问题?鲁宾一本正经地回答,你说的对。没想到一旁的克林顿接着说,你和我在此不得不保持一种轻松的接触。

鲁宾在白宫的所有经历证明,他虽然是干风险套利的商人,却运用自己被人们称为特殊的“解决宏观的社会和谐”的潜质,为美国甩掉了赤字,大大增加了美国公民的就业。

克林顿对于手下助手和智囊机构有一个特别的要求,要他们每一次给他提供决策的方案,一定要是意见广泛的方案,甚至多套方案。鲁宾对付他自己称之为

不确定世界的方法,也是如此。商人与政治家在方法论上完全默契,成为他在白宫充当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高参的重要资本。1993年正是经济全球化浪潮兴起的时候,从墨西哥金融风暴到亚洲金融危机,全球金融业的关联状态越来越紧密。鲁宾认为从1995年开始大量的流动资本通过光缆以光的速度流动。世界经济出现的不确定状态,完全符合鲁宾的感觉。他参与成功助墨西哥走出金融危机的行动,证实了这一点。

从叛逆走向“不确定性”

鲁宾一生中遇见几个十分关键的人。

还在家乡迈阿密念书的时候,鲁宾就遇见了利昂·克罗内斯。他是当地会堂的拉比。他对涉世不深的鲁宾讲他如何不相信上帝,还积极倡导年轻人开展哲学和伦理问题的辩论。

在哈佛大学念二年级时,鲁宾看见哲学老师拉菲尔·迪默斯

教授走进教室上课,旁若无人地把一个废纸篓倒扣在讲台上当教案。从这个细微的动作,鲁宾看到放荡不羁的行为与严禁的治学风格并行不悖同存一人身上,这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引力。果然,迪默斯教授虽然在学识上很认可世界的事物是可以确定的,但是他交给了学生一个完全颠覆的概念:看法和解释永远是由修正和进一步发展所决定的。他的哲学观引导鲁宾开始了怀疑论和批判性思维的精神历程。大胆地怀疑一切,正是当下全球都关注的“不确定性世界”存在的精神摇篮。

成功者有一个共性,就是随心所欲地寻找自己所需要的精神食粮,不拘一格地求教和学习,这也是鲁宾最终成就的关键。他曾经说过不知道谁将会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影响你,那位耶鲁法学院的三年级学生乔治·莱法柯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乔治欣赏法律现实主义的的分析方法,其中一个著名的归纳,就是判决由那天早上法官所吃的

早餐决定的。这种法学观认为判决很大程度上是政策观、信仰、偏见等等产物。他从法律现实主义中吸取到更多挑战确定性的营养。

鲁宾的生活中充满挑战和冒险,他从没听说过风险套利便走进投行,成功了!他从未听说过“决策备忘录”,被选入白宫经济决策智囊,也成功了!如果他只有怀疑一切的法宝,显然是不够的,那样他会成为一个极难相处的人。

他自己对人生的总结是:我的处世方式来自我的基本性格,来自迪默斯的哲学方法和我在哈佛整个学习经历,来自我在纽里文与乔治·莱法柯的辩论以及耶鲁法学院的精神。在套利业,就像在哲学中一样,你要分析,在分析中寻找漏洞,寻找能够站得住脚的结论。

这才是完整的答案,是将商场淘出的精髓运用处理复杂政务的成功案例。

(倪小林)

■来自日内瓦

售房六大关键问题让你卖出个好价钱

□徐千惠

目前,全球房地产市场已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。根据10月份的调查数据显示,房产卖家平均要花7个半月时间才能卖掉一套房子,而一年前大约只需要5个月。今天,我们来谈谈如何找到最佳的房产代理,帮助你以最理想的价格出售你的房子。为此,我们在下面总结了6大关键问题,值得你的关注。

第一,在你决定出售房子之前,需要慎重权衡一下售房的利与弊。你应该决定是否利用房产中介为买家和卖家搭建的交易平台。不过,你不要忘记,房产中介有时是不负责任的,加上他们还要收取6%代理费(国内略有不同)。由于目前已进入买方市场,你首先要给你的房子确定一个有竞争力的售价。同时,还要考虑房产中介的6%代理费、房产交易税费等问题。

第二,如果你权衡下来确实想售房的话,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要挑选好房产中介。我们的建议是对房产中介代理商进行“面试”,你至少要选择两个以上的房产中介作为候选对象。这样,你可以有挑选和比较的选择余地。

第三,当你锁定了两个或更多的房产中介候选人后,你应该和他们进行一次详谈,通过了解他们的历史交易记录等方面信息,来进一步评估他们的专业程度和经验。

第四,找一个容易联络或沟通的房产中介,这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的房子挂牌出售几个星期后也没有任何消息,而你又无法及时联络到那个房产中介。这样的房产中介是不可信的。所以,你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经常沟通的房产中介,他们承诺通过见面、电子邮件及电话等方式来定期告诉你相关的售房信息。

第五,在决定选择了一个房产中介后,你需要和他们确定一个售房的策略,向他们咨询一下他们会以什么方式给你的房子进行推销或定价。例如,有的房产中介采用网络方式售房的,那么他们应当给你的房子拍照,并把这些照片挂到网上。在瑞士大多是通过网络方式来搜索房源,然后再寻找合适的房产中介的。

第六,需要确定一个合适的售房价格。在此,你千万不要仅仅凭你的感觉来确定房屋售价,房产中介通常会给你提供相关的信息。例如,你周边或其他类似的房子在最近一段时间里的交易价格,以及在过去12个月的房子交易信息等方面数据。这些数据会让你同意房产中介对你的房子售价的合理定价。

综上所述,如果你想卖出一个好价钱,寻找一个好的中介公司是非常关键的。好的房产中介可以帮你以最理想的售价出售你的房子。

■多声道

积极推进六大税制改革

楼继伟(财政部副部长):近期我国要积极推进增值税转型、加快推进企业所得税“两法合并”、物业税试点、开征燃油税、完善个人所得税和资源税制度等六大税制改革。其中,对企业所得税“两法合并”问题,将按照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,目前立法的有关准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。在“十一五”时期,应加快增值税转型改革在全国范围推开步伐。另外,进一步完善资源税改革将涉及资源税征税范围、计税依据、减免税政策等。对于燃油税改革,应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重新审视,积极推进燃油税方案的完善,择机实施燃油税。

中国不会出现后奥运衰退

厉以宁(北京大学):中国不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出现所谓的“后奥运衰退”,“后奥运衰退”是指诸多举办奥运会的国家和地区在奥运会后出现经济衰退的现象。中国目前还处于工业化初期,由于更加重视对环保和资源消耗率,固定资产投资仍将保持快速增长,服务业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强。中国8%的经济增长率还能保持15年以

■多棱镜

从毕达哥拉斯的豆子谈起

□杨涛

对于毕达哥拉斯,笔者最早的认识始于初中学习的勾股定理,后来读了点西方哲学史,才知道他曾创立一种宗教,主要教义是宣传灵魂轮回和吃豆子的罪恶性。“他的宗教团体一度到处取得了国家控制权并建立起一套圣人的统治,但是未经改过自新的人渴望着吃豆子,于是就早早都反叛起来了”(罗素语)。据说,毕达哥拉斯在生命的最后逃亡中,因不愿穿越豆子地而被杀害,终于“成也豆子,败也豆子”。

从思想史的高度,在不吃豆子和勾股定理奇妙地共存于毕达哥拉斯这一现象背后,代表了直至康德以来的西方宗教哲学特征,即数学和神学的结合。如果用现代视野加以通俗化,也许从毕达哥拉斯不吃豆子的信仰中,可以解读出几条信息。第一,权威存在荒谬的可能性。第二,“伪规则”缺乏长期存续的基础。第三,信息传递扭曲,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。

在社会发展早期,大概是公众能接触的信息太少,信息

上,而在本世纪上半叶的后25年中,中国经济仍将保持相当的增长幅度。

上半年240亿美元“热钱”撤离中国

王志浩(渣打银行高级经济学家):2006年上半年的误差和遗漏为负84亿美元,这说明资本正在撤离中国,而这些资本外流却没有记录在经常账户和资本/金融账户中,这些外流资本共计240亿美元。为什么热钱的流向发生了逆转?2006年第一、二季度调控房价的风声和抑制房价的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另外,任何资本外流都可能是投资总体回报递减引起的,所有赌人民币升值的套利资本可能已经进入了中国。

气候变化可能损失全球GDP的20%

尼古拉斯·斯特恩(英国经济学家):如果人类任由全球气温继续升高,那么气候变化最终带来的危害有可能相当于每年损失掉全球GDP的20%。与气候变化将损失全球GDP的20%相比,从目前起全球每年只要拿出占GDP1%的投入就有可能控制全球气候变化。(雨人摘编)

■本期人物话语



■本期人物话语

国有企业万亿利润明年有望开征红利

李荣融(国资委主任):国有企业可能从明年起重新开始支付红利。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所有文件,这些文件将于明年得到批准后,将开始实施这一计划。

不对称造成了权威的话语权,而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,有趣的是,当前权威能存在的原因,却多是由于公众接受的信息太多,而被弄得无所适从。权威则由于受过专业训练而具有信息甄别能力,由此获得新的立足点。然而,由于现代经济社会的复杂性,权威在消解社会信息“误差”的同时,也可能引发更多的谬误。近期的一个案例是中国如何处置巨额外汇储备。早期的一批权威观点,更带着情绪化色彩,用非专业的大众语言,把外汇储备描述为一块“唐僧肉”。直到麦金农等国外经济学家指出类似方案的“技术性错误”,很多权威观点才不得不修正或销声匿迹。同样,在房地产市场、收入分配、行业垄断、经济过热与否等问题上,权威谬误的现象并不少见。

至于伪规则,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比比皆是,但是无论基于人性本身,还是事物发展的某种规律,伪规则都会有被人摒弃的时候。然而,在众人都相信“伪规则”的时期,难以预计的损害就会产生。虽然现在看来只是个笑话,但或许毕达哥拉斯教派的不

吃豆子在当时被人看作是大事,当然更具有代表意义的,是豆子问题开创了某种伪规则传统。用现代语言阐释,就是在不置置的表面合理性背后,蕴含着莫名的荒诞。

例如,地方政府具有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某种“原罪”,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成为大家耳熟能详并公认的命题。历次经济调控政策的制定,也都往往以此为出发点。然而,暂不讨论体制问题,在中国经历高速城市化的时期,地方政府的大量资金需求和高投资具有客观合理性。现在,一方面地方税收体系、市场化债务融资体系都没建立起来,另一方面宏观政策把打捆贷款、银企合作、土地出让金等地方融资来源都严加控制,那么城市发展如何能保持持续健康的道路呢?所以未来似乎应少讨论一些地方政府“原罪”,以及事后调控,更多关注理顺事前的城市投融资机制。

再比如,在银行业对民营资本开放方面,也存在很多伪规则。我们在媒体上常看到,某某城市地下钱庄严重扰乱金融秩序,被严厉打击,却很少有人去想这些地下钱庄为什么会存在,

有没有正面作用。而民营银行始终不放开,原因之一也是由于很多人认为私营老板的利润最大化追求较强烈,可能带来更多金融风险。考虑到国有和国有控股银行的种种问题,应该说对于民营银行的想法很多站不住脚。一旦民营银行真获得与外资同样的国民待遇,可能当前许多认识都会成为杞人忧天。

信息传递扭曲,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中,往往带来某种娱乐效果。目前是信息高度流动的时代,以讹传讹的可能性反而更多。例如,前段时间许多人都都在高谈阔论,外汇储备管理应借鉴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模式。笔者同事去考察后发现,淡马锡并不负责新加坡的外汇储备管理。如此之类的信息,始作俑者已无从考察,但扭曲信息的滥用,对经济政策与改革效率的危害不容忽视。

或许笔者对豆子事件的天马行空式联想并不严谨,但人们在自豪于现代文明同时,精神层面可能并不比亚里士多德时代高多少。有时读下历史和哲学故事,能使思路稍微清晰一些。

■经济学家学问故事

经济学的手搭上了地理学大门

□梁捷

自从贝克尔发展出“经济学帝国主义”,经济学家的触手已经延伸到很多领域。用经济学来研究宪政、法律、宗教、民族问题、女性问题都早就不稀奇,最近几年比较热门的交叉学科据说是“新经济地理学”。

它之所以热门,是因为有几个鼎鼎有名的人物都在支持。其中带头的是被誉为天才的保罗·克鲁格曼,他很早就拿过有“小诺贝尔奖”之称的克拉拉克奖,这些年来一直是诺贝尔奖的有力竞争者。可他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却转向“新经济地理学”,长期为各大媒体撰写专栏评论,总是趁机向人们鼓吹,现在要深入理解国际贸易,就得回过头去学习地理学。

还有一个关键人物是布莱恩·阿瑟,他是用复杂性理论研究经济学的第一人。前些年有本名为《复杂》的传记文学在国内红极一时,叙述的便是阿瑟的真实经历。阿瑟意识到现实经济生活中广泛存在的“报酬递增”,而且可以运用到很多地方。

我们如果把一家工厂孤零零设在荒原上,随着工厂做大,再怎么努力也逃脱不了“规模报酬递减”的命运。可若是把工厂设在大城市里,情况就大不相同。城市规模越大,工业基础一般就越健全。无论新建工厂在原料供给上有什么要求,在生产工艺上有什么讲究,往往都可以在城市这样狭小空间内部获得满足。工厂越是扩张,城市越是发展,劳动生产率就越是提高,收益也随之提高,实现了报酬递增。

克鲁格曼对这套思想极为着迷,觉得这才算是把握住现代国际贸易的核心。可是这套“新经济地理学”遭到了地理学者的一致反对。大家觉得,克鲁格曼所玩的这套跟上世纪60年代地理学者就已实践过的“空间科学”如出一辙,设定的前提、论证的思路也都是逻辑实证主义的,只不过克鲁格曼的工作比地理学者更精确、更仔细。但真的用起来,越是精细的工作越是容易看出与现实相悖。地理学者普遍认同这个事实,计量地理模型已被抛弃,克鲁格曼没有推进什么新的进展,倒是在往后退。

其实经济学家一直有研究地理问题的传统,比较早的工作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,德国经济学家屠能写过一本名著《独立国》,详细讨论了“区位”和经济发展的关系。

而19世纪后半叶的大城市兴起促使城市研究成为经济地理学的核心问题。城市化的进程和工

业化的进程是并行的,马克思已经认识到这一点,城市的空间秩序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另一表现形式。马克思没来得及发展出城市理论。倒是有一批学者,主要通过实地考察,熟知了大城市的每个角落,这样慢慢地归纳出一些不那么系统、精确的城市经济学理论来。

20世纪以前的美国并没有贡献出什么大经济学家,但最早的城市经济学研究却是在美国兴起的。霍华德·盖迪斯和芒福德这三代学者,算得上是这个方向上的开创者。他们本身对城市功能有着深刻的认识,对现有城市规划又有强烈不满,而且还对个人的理性充满极大自信,故而都提出一整套最优化建设城市,利用空间的方案。

从20世纪初开始,摩天大楼一幢挨着一幢在美国大城市里拔地而起。原先空旷的平地很快被各种建筑所填满。可是,大城市固有的城市病也纷纷暴露出来,很多都是霍华德和盖迪斯所没有考虑到的。现实呼唤一种全新的、有效的城市地理经济学。

1961年,年轻的简·雅各布斯在全面调查和采集材料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《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》,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造成极大轰动。实践证明,没有一个规划师能比“看不见的手”更好地协调城市功能。

不仅是城市规划和建筑专业人士,还包括文化研究、政治学、社会学的大批学者都敬佩雅各布斯敏锐的观察分析。也有一部分非主流的经济学家赞同雅各布斯的研究方法,认为这才是继承传统的经济地理学,虽然用起来不那么“精确”。上世纪80年代以后,雅各布斯就一直任教于教授经济地理学。从她的课程计划来看,似乎从未叫学生做什么数理模型,只会要求他们实地考察,然后自己设计一套城市规划方案。

今年上半年,雅各布斯不幸去世。全球各大媒体都隆重地推出纪念文章,我们这里也再版了《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》,变得极好。克鲁格曼“新经济地理学”专著通常就放在它旁边,却无人问津。